

# 不容「秘史」盡成灰

## 田中奏摺揭密實錄

(二)

●王成聖 (中外學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 有田八郎誣指偽造

一九二九年十月，日本為解決發動大規模侵華侵蘇戰爭的軍事運輸問題，反覆令其駐吉林特務機關兼吉林督軍顧問林大八，催逼張學良批准修築由吉林敦化到圖們江的敦圖鐵路。

張學良便派吉林交涉署署長鍾毓和該署第二科長羅靖寰赴南京請示。

鍾毓、羅靖寰臨行前，張學良把印好的「田中奏摺」交給羅靖寰，精心將文件縫在羅靖寰的西服背心內，秘密帶到南京，交給外交部長王正廷。張學良還指示北寧鐵路局，將「田中奏摺」譯成英文，準備向國外散發。

中國外交部對「田中奏摺」非常重視，認為可以在適當時機，以非政府立場予

以公布，揭露並遏止日本的侵略野心。

恰在此時，「泛太平洋會議」在日本京都召開。日本代表、外務省亞洲局長有田八郎利用東道國地位，在十一月四日討論「滿洲問題」的大會上放厥辭：「日本在滿洲所處之地位，類乎英國之在印度，美國之在海地！」出席「泛太平洋會議」的中國代表徐淑希、余日章對此義憤填膺，在會議休息時秘密商議，以突然公布「田中奏摺」的方式，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誰知竟被暗中監視的日本特工人員偵知，馬上報告了有田八郎。

有田八郎聞報嚇了一跳，立即向日本外務省請示處置辦法，回來後就主動打上門去，手舉早準備好的長篇文章與中國代表辯論，攻擊中國代表所說的「田中奏摺」純屬偽造，還氣勢洶洶地質問：中國方

面是通過什麼途徑得到的？當事人是誰？主要內容又是什麼？

中國代表因未得到公布「田中奏摺」的指示，覺得在日本不便公開起來源和途徑，更不好涉及當事人，只公布了該文件的主要內容。

有田八郎抓住中國代表不敢公布「田中奏摺」全文的弱點，利用控制輿論的有力地位，大肆宣傳「田中奏摺」是中國所偽造，日本根本不存在這個文件！

余日章回國後，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報告參加「泛太平洋會議」的經過，特別提到日本代表對「田中奏摺」真實性的攻擊。

### 紀清漪印刷廣散發

一位愛國將軍聽了非常氣憤，便把他

手中的一份「田中奏摺」給了南京「時事月報」，該報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全文刊出，這是「田中奏摺」在中國首次正式披露！幾乎與此同時，紀清漪女士在北京也將「田中奏摺」公諸於世。

紀清漪是清朝「四庫全書」總編紀曉嵐的直系七世孫女。

她雖出生在河北獻縣，但卻在東北長大，自幼目睹日、俄帝國主義侵略東三省的種種罪行，形成了強烈的愛國思想。她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學政治系畢業後，即留北京大學主編「新東北」半月刊，並利用「華北日報」副刊成員身分，頻頻著文宣傳愛國思想。

一天傍晚，紀清漪到「華北日報」送稿，見編輯部人員都已下班，只有總編安懷音趴在桌上聚精會神地看一個文件。

紀清漪和他一打招呼，安懷音就指著手中文件氣憤地說：「多令人氣憤！這日本要征服全中國、全世界的計劃。」

你是研究東北問題的，應當看看，也應當知道！紀清漪接過文件剛要瀏覽，安懷音馬上補充說：「對不起，這是內部密件，不能拿走，只能在這兒看一看！」紀清漪見安懷音講得如此鄭重其事，忙低頭

翻閱，立刻意識到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資料，需要仔細研究，不顧對方剛才的認真說明，直率地提出要求說：「能不能拿回去看一看，明天七點鐘以前保證送回來！」安懷音猶豫半天，才同意借一晚上，臨走再三叮囑說：「這是密件，不能給第三人看見！」紀清漪回到北大宿舍，立刻把志同道合的岑日初、馬孀馨、余耀華等人找來，分頭連夜抄寫了一份，第二天七點鐘準時把文件交還了安懷音。紀清漪回來和朋友分手時，約定每人各寫一篇序言，講明此事之目的和經過。

第二天，紀清漪與朋友們仔細商議，都同意將文件印成書，廣為散發，以驚醒國人，奮起救國。只是覺得對不起安懷音，紀清漪說：「為了國家，也顧不得個人恩怨了，不過要在書上向他致歉！」於是，她提起筆在扉頁上寫道：「首先，我要向借給我『田中奏摺』的人表示歉意。我違背了諾言，但這是關係到中國存亡的大事，我只能失信於朋友，不能對不起國家。讀者啊！如果你的心還在跳，如果你的血還在流，你就應該把這個小冊子一字一句地讀完。你就應該想一想：你作為一個中國人，你有什麼責任，你應該做些什麼

事情？」

紀清漪意猶未盡，又在她的序言中寫道：這本書的資料本是極秘密的，我們從朋友處間接得來。先是M君得自日本，節譯出來，自己把它印成一種本子，送給他的幾個至好的朋友，信封上寫著：「極秘，因某種關係，不必公開發表。」後來經過幾度轉折，到了我的手裡，於是我那位供給我這本書的朋友計劃把它重印出幾千份，分贈國人。

在M君的原序裡說：「本報告不論何人，皆不能抄錄持出，因交情關係，故特許之，請閱者切勿將此報告由任何方面抄出，而公表於世界，以免害及涉有嫌疑之人」。紀清漪接著把她的長期序文讀給朋友們聽，最後，更感性地讀道：「我們讀完這本書，應該知道日本的侵略東北，是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千辛萬苦也要達到的。中國當局、民眾應該覺醒了，利刃當頭，還在瞌睡嗎？」眾人聽了連連稱讚，紀清漪卻喟然長嘆：「本人空有報國之志，但沒有這筆印刷經費，怎不難煞人也！」岑日初手撫銀鬚笑道：「這有何難，這點兒錢老夫全包了！我在寫的序言中已表明了決心！」於是掏出他寫的序言讀道：其

老矣，海外歸來，愧無補於國家，但愛國心重，與日俱進。用敢不揣綿薄，量力斥資，將此密摺，付諸鉛槧，公布於世，俾咸知日本謀滅中國之毒計有如是者，群起而拯救之。庶乎吾輩之子若孫，不致淪為亡國之奴，吾亦何敢吝此區區之印刷費哉？

余耀華聽了大笑不止，眾人忙問其故。余耀華笑道：「我看咱們四人之中，只有岑日初能拿出這筆錢，我相信他有一顆赤誠愛國之心，肯定會慷慨解囊，因此早準備好了褒獎他的序文，諸位請看！」馬媮馨搶過讀道：岑君日初，字福元，余摯友也，熱心愛國，故對於社會公益事，無不慷慨捐輸，助成美舉，而報效於黨國者尤巨。邇來因日人謀我，得寸進尺，愈益凶狠，乃奮然而興，語於余曰：「日人之舉動，無非秉承明治皇帝所遺之滿蒙積極政策以進行，倘吾國民眾不急起而謀所以應付之，則吾國必終為日本所亡，吾之子孫，必淪為日人之奴隸！吾縱有財產，將亦有何顏面以享受之乎。……余敬岑君之能自愛其國，而有慨乎近代富人，不獨不愛其國，甚或利所私而害及其國，亦不之恤，故樂為述其顛末，以視岑君，當亦

有愧色矣。」岑日初聽了，擺手連說：「不敢當，不敢當，但不知老馬有何高論？」馬媮馨掏出自己的序文，鄭重地說：「我想指出我們刊出『田中奏摺』的重大意義，不知提法如何，請諸位指教！」岑日初伸手拿過來讀道：「今何幸田中之密摺竟為我國人所探得。同時復有熱心愛國之士，出力以翻譯之，捐資以印刷之，分贈國人，俾咸知日本亡我中國，設計至毒，若不急起以防禦之，將終不免為高麗、台灣之續也。豈不哀哉！則是書之刊行，謂關於中國之存亡之巨，亦無不可，幸我四萬萬同胞注意及之。」

於是，紀清漪在朋友們的大力支持下，把抄來的「田中奏摺」送到北京和平里新華印刷廠印了五千份，分頭寄給全國各地的朋友和記得起來的機關、團體、學校、圖書館，還特別在書背後封七上寫道：閱畢之後，請轉別人。

日人毒計，全國周知。利刃當頭，群起拯之。

就這樣，「田中奏摺」震驚了全中國，轟動了全世界！

「九·一八」事變後，我愛國志士通過種種關係，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底在日本

東京的「中央公論」和「中外商業」上，登出了令人注目的消息：在由關係機關提供給政府之文件中，有田中內閣時代滿蒙積極政策秘密上奏文，其中一節內記有：在滿蒙之韓人，倘加至二百五十萬人以上，則一旦有事之際，可以韓人為原子，而作軍事行動，藉取締之名義，而援取其行動。

日本當局大吃一驚，做夢也未想到在對日本出版物嚴格檢查的情況下，竟有兩家很有影響的報刊把承認有「田中奏摺」存在的文章登了出來！日本最高當局氣急敗壞，下令嚴格新聞檢查，並出動警察、憲兵阻止「田中奏摺」和有關出版物進口，禁止其在日本傳播。若發現傳播上述報刊者，一律按危險的「思想犯」論處。日本當局很快從攻占瀋陽所獲文件中獲悉，床次竹二郎和蔡智堪有牽連，便開動宣傳機器，罵床次為賣國賊，將蔡智堪逮捕入獄，二百萬美元的財產被全部沒收。

### 國際聯盟舌槍唇劍

一九三一年十月，國際聯盟在日內瓦召開第六十五屆理事會，中國代表顏惠慶就「田中奏摺」問題向大會提出控告：自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日本侵略態度稍見減緩。

顧自一九二八年田中男爵重握政權以來，日本又進行其不惜代價惟求得之積極政策。此項政策，詳備說明於一種公文之中，即報紙所載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田中上呈日皇之奏章是也。「田中奏章」之真偽，曾有辯論，然自其披露後發生之事故，與該奏章所載之次第計劃，若合符節，故不能不以該奏章為日本對華真正之具體表現也。茲錄該奏章一段如下：

「九國條約削減日本在滿蒙權利特權之處，致使日本毫無自由。日本之生存，已遭危害。……日本如不採取鐵血政策，則不能解除其在東亞之困難。……若日本欲管理中國，必先擊碎美國。……若日本本不得對俄作戰也。但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則其餘亞洲各國與南洋各國，必懼而降服。然後世界各國乃曉然於東亞之屬日本，不敢侵犯日本之權利矣。此為明治天皇之遺謀，其成功也，日本之生存系焉。」此次日本轟毀上海閘北、吳淞及鄰近村落，顯示所謂鐵血政策者，必以名實相符出之也。

出席國際聯盟理事會大會的日本代表松岡洋佑早有準備，鼓動如簧之舌，矢口否認存在「田中奏摺」，說該奏章是中國捏造的產物，說起「語氣與格式不對」，「將田中訪問菲律賓誤為訪問歐美」，「把已經去世的山縣有朋等重臣仍寫為健在」，「所提蒙古王爺之事並不存在」等等。

在國際聯盟理事會上，中日雙方唇槍舌劍，爭論激烈，「田中奏摺」問題一時成為國際間的熱門話題。對當時的情景，當事人、中國代表顧維鈞在其回憶錄中稱：「日本新任代表松岡洋佑又代表日方發言。據我回憶，他的確是個對手。他以政治敏銳、能言善辯和主張日本對華採取不妥協政策而聞名。他夸夸其談，在為日本的不妥協立場辯護時，極盡玩弄辭藻之能事。我在下午的會議上為中國辯護，以一個半小時發言進行還擊。……我詳細申述了日本的大陸政策，強調這是對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脅。……國聯會議一直延續多日，其中心是松岡洋佑與我不斷的辯論。」在記者招待會上，有個記者針鋒相對地提問道：「一個島國，怎麼能有與其國力不相符合的野心呢？」對此，中國代表

顏惠慶並不慌張，因為他已有準備，請王家楨起草好了發言稿，因而當即回答道：「當您去馬戲團或戲院觀賞時，有人在入口處交給您一張節目單，上面印的節目是意大利的歐貝拉（歌劇）、俄羅斯的芭蕾舞、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您看了這張節目單，一定頗疑惑，不相信這個節目單是真的。您或許會覺得這樣一個小戲院，怎能演出這樣的大節目呢？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幕拉開了，演出的正是節目單上的第一個節目，那麼，您對節目單上以後的節目，還有懷疑的餘地嗎？」顏惠慶巧妙而形象地把「田中奏摺」比作節目單，將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喻為第一個節目，博得了在場記者和各國代表的熱烈掌聲！這是中國代表首次在國際會議上證明「田中奏摺」的真實性，立即引起強烈的國際反響！

張學良得此消息深受鼓舞，為報國恥家仇，他以北平綏靖公署主任身分下達命令，大量印發「田中奏摺」的中文和英文譯本，分發所屬各部官兵和有關方面，提高東北軍將士的抗日熱情，隨時準備打回老家去，但受阻於「不抵抗政策」，無功而廢。

(二) 田中奏摺揭實錄

其後，日本帝國主義按照「田中奏摺」確定的侵華步驟，於一九三七年七月發動「七·七事變」，將侵略矛頭指向華北。應日寇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的邀請，日本軍部同意把川島芳子派到天津從事漢奸特務活動。行前，日本陸軍大臣白川義則和土肥原賢二把川島芳子請到陸軍省，白川義則交代任務時特別叮囑道：「芳子，我認為你去的正是時候。現在，『滿洲國』已漸漸趨於穩定。按照田中義一奏摺制定的計劃，下一個戰略進攻要點，當然是中國的華北了。你知道，現在大日本皇軍已突破了中國長城各口，我們大日本必須趁著英美無暇顧及，蔣介石又熱衷於剿共的有利空隙，像插進一塊肥肉的尖刀那樣，大大地楔進我們的軍隊。天津是我們帝國苦心經營多年的一個橋頭堡，又是中國的重要港口和海上門戶，當年八國聯軍就是從天津口岸的大沽口打進去的。天津又住著中國朝野的許多官吏、富賈和軍閥。這些人多年來操縱著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命脈，特別是日本在這座城市裡還擁有一塊租界地，作為憑依，是可以幹出許多大事的！芳子，多田將軍既然叫你去協助他，我相信你到那裡一定會如魚得

水，大有作為的！希望你好好幹吧！」於是，川島芳子帶著土肥原賢二的介紹信，偕其「夫人」仙鶴子來到天津，創建起東興樓，與三野公館勾結起來，死心塌地為貫徹「田中奏摺」而效犬馬之勞！

由於日本侵華步驟與「田中奏摺」極為合拍，國際輿論對「田中奏摺」漸趨肯定，日本當局對皇宮洩密事件嚴厲追查，御文庫書庫二十八名管理人員全被免職，又誣稱「田中奏摺」是中國遼寧國民外交協會，根據關東軍制定的「關於滿蒙政策的意見」加工炮製的，但也無濟於事，只得動用日本憲兵和警察，企圖將所有的「田中奏摺」統統收繳銷毀。為追蹤「田中奏摺」的一個節錄本，日寇一九三九年在哈爾濱大肆搜捕「思想犯」，一次就逮捕二百多人！

日本右翼再挑爭論

二次大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開始在東京前陸軍省大廳，對日本戰犯進行嚴正審判，這就是舉世聞名的東京審判。

審判庭位於東京被廢墟包圍的小山上。那裡曾是侵略戰爭的大本營，日本軍國主義者按照「田中奏摺」，在那裡炮製過侵華和侵略亞洲的狂妄戰爭計劃，指揮幾百萬日本軍隊屠殺成千上萬的中國和亞洲同胞！更具有莫大諷刺意味的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庭長室就恰恰是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的辦公室！

參加訴訟的各大國聯合公訴代表達西手舉一份編號為一六九的重要文件——「田中奏摺」，控告東條英機等被告犯有破壞和平的罪行，即犯有準備、發動和進行侵略戰爭的罪行。

接著，達西援引「田中奏摺」中最典型的幾段文字來揭露戰犯們的罪行：日本若不施行鐵血政策，則不能消除東亞的困厄；但若施行鐵血政策則必將與美國相抗衡。……若要掌握控制中國的權柄，則必須擊敗美國。……然而，為征服中國，則必先征服滿洲和蒙古；為征服世界，則必先征服中國。倘若能征服中國，則其餘亞洲國家和南洋諸國均將畏我並向我投降。……我們如能掌握中國的全部資源，即能轉而征服印度、南洋諸國、小亞、中亞，甚至歐洲。假若大和民族願意在亞洲大陸有突出作為，則奪取對滿洲和蒙古的控制權乃是第一步。達西巡視審判廳一周，又

振振有辭地指出：「總之，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制定的計劃，規定了循序的分階段的侵略活動，以便按日本帝國的需要完全重新瓜分世界。」

踏上這條道路的第一步就是占領滿洲、外蒙和內蒙。這些地區是日本進一步侵略擴張的跳板與基地！公訴人達西又舉起放在法官席上的「田中奏摺」說：「田中將軍也沒放過蘇聯問題，在奏摺中公然說：『為奪取北滿的財富，日本看來還必須在蒙古大地上再次同俄國交鋒，這一點也列入了日本的發展規劃。』田中義一雖在兩年後辭職，但他的計劃卻繼續由日本各屆政府始終不懈地推行著，而且這份凶惡之極、厚顏無恥的文件，還被偽善的日本統治集團譽為『田中之積極政策』。」公訴人達西接著揭露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和內外蒙古的原因：日本一旦占領東北，向北可對毗鄰的蘇聯領土實施突襲，將蘇聯濱海地區同蘇聯本土分割開，並通過外蒙奪取蘇聯的遠東地區；向南可以東北為跳板，揮師進入長城地區，直逼古都北京。達西講到這裡，以更洪亮的嗓門做出結論：「總之，『田中計劃（奏摺）』的宗旨是極其明顯的，是日本侵略野心的大暴露！

「接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通過對岡田啟介、田中隆吉等人的傳訊，證明炸死張作霖、發動「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都是按照「田中奏摺」確定的既定方針實施的，並間接承認「田中奏摺」是根據日本法西斯理論家大川周明的「思想鼓吹出來的」！特別是曾任田中內閣書記官長的鳩山一郎，向國際檢察局提交了一系列關於「田中內閣即將辭職時的滿洲事變的文件」，承認有田中義一呈交裕仁天皇的「內奏抄本」，使東京審判逐步向縱深發展。

日本右翼和保皇派見中國代表將裕仁天皇列入戰犯名單，並將「田中奏摺」列為戰犯罪證，又見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步步深入，忙通過各種渠道與美國方面疏通關係。恰好美國出於戰後冷戰政策的需要，轉而採取利用日本和天皇的政策。美國深恐一味追查「田中奏摺」會危及天皇制，引起日本社會動亂，因而決定以「真偽莫辨」為由，否認「田中奏摺」的存在，並不擬起訴天皇，正如日本研究東京審判問題的專家栗屋憲太郎的「東京審判秘史」一書所精闢分析的那樣：鳩山一郎雖然擺出了一副協助檢察活動的姿態，但為了

辨明田中內閣的對華政策，他要了一個小花招。他提供的資料本身都是第一級政治資料，如田中首相呈交給天皇的「內奏抄文」，其中說炸死張作霖的主謀是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等人，但是檢察局並沒有把這些資料作為法庭證據使用。這是因為檢察局已經決定了免究天皇責任的方針，而鳩山提供的資料如果使用不好，會是一柄「兩刃劍」，成為重新追究天皇戰爭責任的材料。在田中首相的奏摺中，清楚地表明天皇完全知道炸死張作霖的凶手是日本軍人。可見，鳩山提供的資料和吉田茂提供的文件不同，並沒有被當作法庭資料加以靈活運用，只是隱藏在歷史的陰影裡。

在廿世紀五十年和六十年代，日本右翼勢力活動猖獗，再次挑起關於「田中奏摺」的大爭論，觸怒了兩個當事人蔡智堪和王家楨，他倆終於站出來講話了！（下期續完）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